

■教育时评

文·李斌

靠法治终结“招生乌龙”

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就沈阳音乐学院部分考生家长上访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沈阳音乐学院在考生专业考试合格证书上标注“计划名额之内”的行为属违规,应认定为无效。至于到底能不能对受影响考生进行补录,目前依然没有答案。

事情的始作俑者是沈阳音乐学院。学校招生时许诺“计划名额”将省外剩余招生计划调整到省内使用,违反了教育部“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等相关规定,给考生造成错误引导,以至于他们无法入学。对此,沈阳音乐学院必须承担违规责任。然而,截至目前校方责任还未被追究。

尽管已经被定性为违规,任意调整省内外、各专

业招生计划的潜规则被公诸天下,沈阳音乐学院却声称,是因为工作人员丢失和遗漏教育厅文件才造成相关政策未得到履行。以这样的理由来为机构过错开脱,恐难服人。按照教育部规定,省级招办负责监督高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纠正违反国家招生政策、规定的行为。既然辽宁省教育厅认定沈阳音乐学院属违规招录,就应当彻底调查违规操作的来龙去脉,给大家一个交代,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如此方能不负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对无学可上的考生而言,他们是此次违规招生的受害者,如果再因为救济无门、善后无策而受到“二次伤害”,显然有违教育公平。诚然,教育行政部

门和高校必须严格按照制度和规定办事,以维护招生计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校方违规,后果不能让无辜的考生来承担。如何给他们一个说法,给焦灼中的梦想一条出路,考验着有关方面的责任和智慧。

审视这场“招生乌龙”风波,也要反思,教育领域的公平正义到底靠什么来保证?近年来屡禁不止的违规招生问题到底该怎样求解?此次事件中,不仅存在高校违规操作、责任追究一再推迟等问题,在政策执行环节上也暴露出许多漏洞,比如传达和贯彻调整招生政策的文件,教育厅和高校负责人既没有进行面对面或电话沟通,也没有回执确认,教育厅和高校都不清楚教育部是否在设置男女招生比例方面对艺术

院校有特殊规定。如此粗枝大叶、随意为之,法令规章岂不是一纸空文?这正说明,回归法治,教育才有真正的公平。只有在法治框架下,教育行政部门严格依法行政,高校等教育机构严格依法自主招生,打破潜规则,杜绝随意性,教育的公平底线才能得到捍卫。

立法不足以自行。此次事件暴露出高考招录、行政监管等多个层面的法治不彰问题,既是反思教育公平的案例,也凸显了弥补教育法治化短板的迫切。唯有严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学校依法自主招生、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考试招生原则,在法治轨道上办好教育的事情,才能防止类似问题重演。

■教育快讯

我国力争3至5年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制度化

为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提高薄弱学校教育质量和水平,教育部将出台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意见,指导地方推动校长、教师有序流动,力争用3至5年时间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

据教育部网站介绍,2011年和2012年,教育部分别与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3年来,各地出台不同政策,缩小义务教育发展差距。2013年,全国有293个县(市、区)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截至6月19日,2014年又有104个县(市、区)通过评估认定。

据了解,由于我国一些地方教育基础相对薄弱,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实现均衡发展任务艰巨。针对这些情况,教育部将出台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意见,同时,通过推进学区制管理、免试就近入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集团化办学、学校联盟、城乡一体化办学等措施,提高薄弱学校教育质量和水平。

此外,教育部表示,目前还有8个省份没有一个县(市、区)通过国家评估认定。针对工作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地方,要进行督促和问责。教育部将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动态监测机制,定期对各地义务教育发展差距进行监测,以适当方式公布监测结果。

全日制本专科学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增至8000元

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四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对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和资助比例进行调整。按照通知,包括第二学士学位和高职学生在内的全日制本专科学学生每人每年可申请不超过8000元的助学贷款。

据介绍,现行的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上限为每人每年6000元。调整后,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8000元的,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上限将达到12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12000元的,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

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调整后,有关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资助的标准也相应调整为本专科学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资助的其他事项,仍按原规定执行。

通知说,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全国平均资助比例应与当年国家助学金资助比例相当,各地区、各高校资助比例应与本地区、本高校当年国家助学金资助比例相当。全日制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比例则根据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等奖励政策覆盖范围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确定。

通知同时强调,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学生在同一学年内不得重复申请获得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只能选择申请办理其中一种贷款。全日制研究生原则上可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此外,各高校要按照相关规定,承担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的50%,并配合经办银行核准申请贷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标准。

上海规定市属高校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

“大学教授必须给本科生授课,并鼓励上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近日,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做客上海广播电视台节目时说,上海今年已作出规定,要求所有市属高校的每位教授必须进课堂为本科生上课。

翁铁慧表示,大学一定要把本科生教学作为办学“生命线”,政府则要把高校本科生教学质量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最重要指标。她坦言,这些年对教师、学校评价的“指挥棒”出了问题,造成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博士刚毕业,还不具备教学经验的副教授马上给本科生上课,而教授们则往往忙于科研。现在要做的,是把教授的‘人’和‘心’都拉回课堂上来。”

据新华社报道,与之相呼应,上海大学今年5月发布的“2013年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显示,多数本科生都希望教授能经常授课,而不是到毕业都不认得本科的“知名专家”。不少学生表示,教授讲授的新生研讨课、通识课等课程更加有趣。

另据透露,上海今年已要求除部分研究型大学中的一些科研类编制教师外,所有市属院校的每位教授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且鼓励教授基础课或者专业基础课,否则便不能评教授岗位;对于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则需先担任2至3年的助教,跟着导师进课堂为学生辅导、答疑、批改作业,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才能上台为学生授课。

据悉,上海一些高校目前已出台相关规定,对教授、副教授每年需给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数、课时作出要求,并对教师晋升高级职称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价实行“一票否决”。

翁铁慧认为,高水平的大学教师从事科研工作能更前沿、更专业的知识带给学生更多启发,但科研大部分时候应该为教学服务,不能本末倒置。

“现在的大学教师,不是钱的问题,这也不仅仅是大学面临的问题,其他大球也是如此。教育应该融入大家的生活,成为平时休闲娱乐的一部分,这就牵涉到改变生活方式的问题。”北京人大附中足球队教练胡建平说,“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很难愿意在当下这个环境下让孩子去踢球。中国足球的出路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在发展的过程中,让孩子们先喜欢体育,喜欢足球,当体育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踢球的孩子就自然而然地多了。”

让科学仪器创制链条活起来

——北京大学助推科学仪器创制探索之路

文·本报记者 刘莉

五年间,学校获国家和北京市仪器研发相关专项经费1.2亿元人民币;黄岩教授“基于荧光产生的数字化PCR”装置吸引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年累计1亿元的合同;曾立民教授“在线气溶胶有机污染物检测系统”引来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仪器产业化资金200万元……如此之多关于科学仪器创制的利好消息密集出现,即使对北京大学这样的著名高校也是不容易的事。

高端科学仪器的创制研发,由于其对相关技术领域关联度高,加工难度大,属于先进制造业的高端产业。从某种程度上讲,高端科学仪器的创制能力是反映一个国家先进制造业水准的标志之一。欧美日等

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始终将“发展一流的科学仪器支撑一流的科研工作”作为国家战略加以重点发展。而在我国高端科学仪器领域存在着高进口依赖度;原创能力不足;高端人才缺乏等问题。近年来仪器及关键技术创新也逐渐成为我国关注的科研热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将科学仪器创制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领域。

从2009年起,北京大学开始探索一系列推动科研仪器设备创制工作的新机制,为高端科学仪器研发、创制,提供了从制度安排到实践探索的样本。2013年北大再获北京市科委“高校科学仪器研发创新与服务试点”专项支持,进一步为推进科研仪器创制积累经验。

为组织仪器创制工作成立专门机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仪器设备对科学研究的作用不言而喻。2009年北京大学在高校中率先成立了“仪器创制与关键技术研发中心”,并设立“仪器创制与关键技术研发基金”,旨在整合学校科研力量,加强仪器自主研发。同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市科委联合建立北京大学研发实验服务基地,在促进科研资源面向市场开放的同时,充分利用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资源和影响力探索原科研仪器的创制与产业化路径。

新成立的“仪器创制与关键技术研发中心”肩负重任:重点培育、扶持有一定前期基础、受益学科广、对科研有关键支撑作用或具有良好应用和转化前景的科学仪器创制研究项目,包括新仪器的研制、原有

大型仪器功能的创新性拓展与改造、关键工艺和技术的革新与突破等。中心还设立以主管校长为主任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心发展规划,把握中心发展方向,并委托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负责组织仪器创制项目的评审、验收,成果鉴定等工作。

北大拥有国内最强的基础研究实力和学科综合优势,特别是在“仪器研发基金”的培育和引导下,有效催生了一批高端仪器研发成果。为了拓展已有的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北大选择了专业运营机构——北达燕园已大量开展科技服务活动为主营业务方向,重视科技资源的汇聚与梳理。目前整合并进入服务目录的1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和科技条件设施总价值已达13.54亿元,1531台套。

“育苗”基金让仪器创制的想法变为现实

2009年北大在国内高校中设立首个仪器研发基金,培育学校相关领域科研力量,遴选优秀项目进行先期资助和扶持。截至目前,基金累计拨付800万元。北大研发实验服务基地副主任江向峰介绍,基金的评审主要有两大指标:一是优先扶持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对新概念、新理论具有显著验证价值的仪器创新开发,帮助其获得国家和北京市层面更大的关注和投入;二是重点资助能够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仪器创制与技术创新,促进科研成果的开发和应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被看作“种子”或“育苗”基金的这一校内项目,在仪器研制初期提供25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使其具备能力能获得更多支持;如第四期项目获资助人物理学院颜学庆教授的“超小型激光离子加速器及关键技术研究”获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支持,获批经费6219万元;第一、第三期资助人工学院黄岩教授的“基于荧光产生的数字化PCR仪研发”项目获科技部国家科技计划社

会发展科技领域项目支持,获批经费1948万元。

“基金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促进了学科的交叉融合。”江向峰说,科学仪器的研发往往不是一个专业能够完成的工作,以生命科学领域的仪器为例,需求由生命学院提出,但仪器的创制可能需要电子、信息、物理、化学、精密仪器制造、成像等多个专业合作。基金的出现让这种合作更容易实现。“今年新引入的申报者互相打什么也是希望大家能有更多交流,知道对方的强项是什么,促进院系间跨学科的合作,为新仪器创制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自基金设立以来,所获资助的项目共发表文章71篇,其中国际刊物58篇,国内核心期刊11篇。四大检索中,SCI、EI、JSTP收录的分别为62篇、8篇和7篇。国内专利27项,8项已获批。国外专利4项正在申请中。开发软件和数据库4套,研制新仪器和新方法6套。人才培养方面,博士后20人,博士生85人,硕士生46人,40岁以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12人。

■图说教育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8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江西省遂川县罗文村,在接下来的21天里,他们将与此地的孩子们朝夕相处,和他们一起开展素质拓展、励志美德、趣味知识等活动。 新华社发(李方宇摄)

专业运营机构为仪器与市场搭建桥梁

2014年3月14日,北京大学研发实验服务基地组织工学院有关老师与鞍山钢铁研究院开展一一对接,落实鞍钢在仪器分析手段与分析仪器研发方面的11项企业需求。像这样为研究仪器的老师和市场需求对接的服务活动,北大研发实验服务基地经常会有。

作为学校科技资源的社会化运营主体,北达燕园微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通过具体的商业活动找寻社会研发试验需求与高校优势科研资源进行良性互动。利用北大资源为企业提供免费专业的服务的同时,也为大学科研人员找到市场的合作者。

科技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让高校院所的仪器设备走出高墙。北京市科委主任何德福曾评价这种做法说,“专业运营机构的引入,突破了高校院所对外开放的机制障碍。科技资源面向市场开放,有助于资源方、科研人员、需求方多方共赢。”

为更好的为高校仪器研制和市场需求牵线搭桥,北大研发实验基地通过各种途径为双方“签字”努力。他们按计划参与各类专业论坛、会议,通过主题报告宣传促进学校成熟科研成果推介落地。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国产检测仪器设备验证与综合评价技术服务推介会……各个高端仪器设备会议中都能发现北大仪器研究人员组团参与,他们或作主题报告,或展示自己的最新仪器研制成果。而背后组织他们参与这些会议的,就是学校的研发试验基地。

除此以外,基地还重点关注企业与实验室的“点对点接触”,即一事一企业一实验室的点上工作。为让实验室和企业相互了解,基地还经常组织企业走进实验室。5月20日,他们刚刚组织企业到设在北大的北京核磁共振中心开展交流对接活动,详细介绍北京核磁共振中心的研发实验服务能力。

校园足球 如何突围?

近日,在上海的几所中学里,举行了第十二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对于中国足球而言,由教育部门主导的体育教育改革举措无疑是提升足球群众基础、特别是青少年足球人口的重要“推手”。而校园足球自身如何才能突破困境、走出新路,让学生们在球场上重燃青春活力,值得人们期待。

年龄越大 踢球越少?

“现在是小学的校园足球搞得比较好,到了初中高中,孩子们就不愿再走近绿茵场了。”参赛的广州市南武中学足球队队长陆毅说。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等边远地区,校园足球都面临着随着学生年龄增长、课业增加,足球发展之路越来越窄的困境。

四川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足球队教练樊渝告诉记者,现在的青少年足球越往上走,发展得越不好。“小学课业压力小,家长愿意孩子出于锻炼的目的来踢球,到了初中高中,由于踢球出路不好,又担心影响学业,家长不愿意孩子踢球,因此很多足球好苗子都在小学、初中就流失了。”

来自新疆的木合普拉是本届学生运动会新疆男足的主力,今年初三毕业的他虽然深爱足球,却

也不得不向家长和学业“低头”,逐渐疏离足球。“我们新疆有很多好的足球苗子,但是父母觉得踢球看不到出路,因此都不让孩子们去踢球。”木合普拉说。

“青少年足球谈了很多年,说得多做少,重点还在于把政策落实到位。”辽宁大连八中足球教练表示,现在初中选拔足球苗子很困难,学校文化课要求高,家长不支持,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大家都是嘴上说政策,心里没有底,自然难以落实。”

打通升学 有出路才有信心

由教育部门主推校园足球,让人有很多期待。因为与体育主管部门相比,教育部门对于校园足球的改革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不仅因为教育部门掌握了大量的青少年资源,更因为在九年义务教育与高中、大学的衔接方面,教育部门有更多经验与主导权。

初中与大学的顺畅衔接,不仅关系到“足球小将”的出路问题,更是校园足球发展的关键问题。年龄越大、踢球越少的尴尬境地,折射的正是家长、学校乃至学生自己对校园足球出路的不自信。

据了解,未来教育部将把学生体质状况和体育特长生如实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并通过招生考试,疏通足球人才成长通道。如果这一举措能够切实有效地得到落实,那对中国足球而言“善莫大焉”,由此不仅将拓展大量的青少年足球人口,更会带来源源不断的优秀足球后备人才。

学校对有体育特长学生的特招,并在高中、大学中继续专项突破,在欧美等国已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许多闻名世界的美国体育明星,都出自名牌大学;篮球、橄榄球等职业联赛中的运动员,更是绝大部分都来自高校。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年仅17岁的美国女将米西·富兰克林以四金一铜的佳绩一战成名,成为美国游泳军团的最大黑马。然而虽被誉为“女版菲尔普斯”,但富兰克林更想向菲尔普斯这位老大哥请教的,不是游泳技术,而是如何用奥运金牌赢得一张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环境与时间 足球突围需“两翼齐飞”

近年来假球、黑球、赌球等问题频出,足球圈已然变成“大染缸”,使得不少家长要求孩子对绿茵场敬而远之。上海曹杨二中足球队领队倪伟国告诉

记者,由于目前足球的大环境不理想,让家长、学校都对孩子踢球顾虑重重。

“大环境对足球发展很重要。比如1999年女足夺得世界杯亚军之后,女足涌现出一批球员;2000年左右时,甲A联赛风风火火,中国男足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那时候很多家长愿意孩子来踢球。”倪伟国说,“好环境与青少年足球可以相互促进、良性循环,而不佳环境则侵蚀着足球的群众基础。”

除了环境,时间与耐心也是校园足球突围的关键。不少基层的足球教练和球员都认为,近几年校园足球的发展还是有进步的,由于足球是一个需要长期培养的项目,因此全社会也应该给校园足球一点时间和耐心。

“现在的足球需要时间,而不是钱的问题,这也不仅仅是大学面临的问题,其他大球也是如此。体育应该融入大家的生活,成为平时休闲娱乐的一部分,这就牵涉到改变生活方式的问题。”北京人大附中足球队教练胡建平说,“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很难愿意在当下这个环境下让孩子去踢球。中国足球的出路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在发展的过程中,让孩子们先喜欢体育,喜欢足球,当体育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踢球的孩子就自然而然地多了。”